



近代名文导读

近代 教育文选

夫新教育所以异于旧教育者，有一要点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谓也。



主编 戴逸
注译 郝秉键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近代名文导读

近代教育文选

JINDAI JIAOYUWENXUAN

主编 戴逸 注译 郝秉键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教育文选 / 郝秉键注译.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5

ISBN 978 - 7 - 80752 - 806 - 7

I. ①近… II. ①郝… III. ①教育思想—思想史—中
国—近代—文集 IV. ①G40—092.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624 号

近代教育文选

JINDAI JIAOYU WENXUAN

主编 戴逸 注译 郝秉键

责任编辑 刘冰

封面设计 张科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 行 科 028—86259422 86259423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1mm×225mm

印 张 13.1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2 - 806 - 7

定 价 23.00 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电话:028-84122206

序 言

戴 逸 杨东梁

十四年前，我们曾编辑过一套《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共 39 册，由巴蜀书社出版。当时，我们诚邀了十几位在京的文史专家和出版社的几位高级编审组成编委会，同时，约请了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共同成就了此套丛书。

之所以要编辑该丛书，是要让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更多地了解一点近代中国人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探索富国强兵之路，寻求救国、救民之途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在祖国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中华民族逐渐觉醒，奋起抗争。许多仁人志士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为祖国独立、民族复兴呼啸着前进，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中国近代文学就充分突出了爱国主义这个主旋律，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跨过道道难关，迎来光明的前程。而今天的青年人既没有一百多年前那种举步维艰、风雨如磐的感受，也缺少较为丰富而形象的近代历史知识。阅读近代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则可以引领他们进入那个逝去不久的时代，聆听其心声，体察其情感，品味其所思所求，从而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所走过的那段路程。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 20 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事件，是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完全意

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且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开辟了道路。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与巴蜀书社商定，从《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选出十二种，分别编成两套丛书：一套冠名为《辛亥百年——名家经典导读》，共收六种，即：《孙中山文选》、《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诗文选》、《辛亥烈士诗文选》、《章太炎诗文选》、《康有为诗文选》、《梁启超诗文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献出了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留下了数百万字的遗著，其中不乏思想深邃、语言犀利、富有文采的名篇佳作。

黄兴、宋教仁、朱执信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是革命党人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们或因操劳革命，英年早逝；或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为宪法流血”第一人；或极富理论才华，却惨死在军阀屠刀之下。他们的诗文都有强烈的爱国、战斗精神，但其艺术风格却不尽相同，或慷慨悲壮，或清新淳朴；或奔放，或含蓄；或犀利，或深邃，因人而异，各具特色。

我们还选收了三十多位辛亥烈士的诗文遗作，这些烈士具有坚定而高昂的革命斗志，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他们把生命的价值与祖国的富强、同胞的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其诗文有的是临阵发出的誓言，有的是临刑留下的遗篇，真可谓声声血泪，句句铿锵，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一页。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说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那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尖锐地批驳了保皇派的谬论，酣畅淋漓，脍炙人口。他一生著述颇丰，涉及面广，于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诸方面均有建树。尤其是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语），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他晚年虽脱离民众，渐入颓唐，但也不过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

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但在辛亥时期也是政坛和思想界的活跃人物。他们宣传保皇，反对革命，追求君主立宪，与革命派进行了激烈辩论。把康、梁的诗文收在《辛亥百年》丛书中，可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辛亥时期涌动着的不同思潮，展现出的不同政治主张。须知，正确的思想总是在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两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更何况康、梁也曾经位列中国近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中，也曾一度领舆论之风骚，只不过当时代继续前进时，他们未能追上潮流，成了落伍者。

另一套丛书冠名为《强国之梦——近代名文导读》，共收录了《近代实业文选》、《近代法制文选》、《近代教育文选》、《近代报刊文选》、《近代经世文选》、《近代名人日记选》共六种。这是从文学体裁角度入手，选编近代仁人志士为追求国家富强而发出的声声呐喊。

振兴中华的有志之士围绕如何使中国转弱为强的现实问题，提出“兴实业”、“振商务”，学习西方。有人更身体力行，将“实业救国”论付诸实践；近代的爱国者在寻求民族振兴的道路上，还提出了改革政治及法律制度的种种主张和方案，推动了中国法制思想和法律制度的进步；至于教育，更为历代中国人所重视，时至近代，有人甚至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而资产阶级革命家则提出“革命之教育”，把中国教育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近代报刊也在中华大地上勃然兴起。开始是外国人在中国办报

纸，至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他们鼓吹以西学为师，变法图强。甲午战争后，办报形成热潮，并成为传播启蒙思想，宣传救亡图存的锐利武器。辛亥之后，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有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此外，由于报刊文具有时效性、纪实性和趣味性，自然得到读者的青睐，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说到近代经世文，顾名思义则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产物，它宣扬进化史观和社会改革思想，标榜“采西学”，开风气，睁眼看世界，力图为纠封建末世之“时弊”而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近代名人日记涉及近代一些著名人物的思想、活动，而且往往是亲历亲为，可作为其他史籍的佐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再则，有些日记出自文学名家之手，更显得细腻生动，文采斐然。

我们今天能够重新编辑这两套丛书，一是出于巴蜀书社的积极推动，二是有诸多作者的大力支持。由于巴蜀书社的编辑先生们精心策划，反复推敲；各位作者兢兢业业，认真修订，终于得以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将两套面目一新的丛书奉献于读者面前，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星移斗转，物是人非，在我们今天重温旧章之时，其中两位作者——桑咸之教授、林庆元教授却已驾鹤西去，这让我们唏嘘不已，悲痛系之！两套新版丛书的推出，也是对他们的纪念吧。

2011年4月于北京

前言

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从此，中国开始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与这一剧烈的社会大变动相伴随，中国教育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传统教育逐渐向近代教育转变。在新旧教育体制的转化斗争过程中，教育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纷纷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教育主张，从而使中国近代教育界呈现出一派纷繁复杂的局面。不言而喻，如此丰富的教育著述，很难用一选编书予以囊括。因此，本书只能主要收录著名教育作品，同时尽量顾及各派教育家的著述。为帮助读者了解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有必要首先对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状况作一概述。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宁静。面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华夷”战争，一些开明地主派率先从太平梦中惊醒，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并提出一系列旨在挽救时局的教育主张。其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先驱。

首先，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反对专事义理、考据、词章等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学以致用。龚自珍认为，一代的政治就是一代的学术，学术与政治本来就是统一的，所谓“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

……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①。因此，他抨击了科举制的弊端，主张恢复西汉以前的经文，并努力寻求古代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和“经世致用”之学。魏源也对当时教育现状非常不满。他主张废除书法试帖，学习有实用的学问。他说：“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章程、讨国故始，舍胥史例案而图诂谟，图远猷始”^②。魏源和龚自珍一样努力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反对偏重训诂考据、脱离实际的“古文经学”。他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序文里指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意思是说，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应当从现今实际事物出发。因此，他强调实际活动——“行”的重要性，主张先行后知、知从行来，反对“俗学之病人”和“腐儒之无用”。

其次，龚、林、魏等人要求学习西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教育方针。林则徐不满当时教育的空疏无用，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因此，他在广州禁烟时，曾“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购买其新闻纸”，并把有关西洋的历史、地理、政治等材料编成《四洲志》。这是中国近代介绍西洋各国概况最早的著作之一。林则徐的“师敌”思想，后来又被魏源继承并有所发展。魏源根据《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例律》等介绍西方史地、政法方面的书籍，加以增补，著《海国图志》，增添了很多西方科技方面的材料，并介绍了美国、瑞士等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在这部书中，魏源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大力称颂西方科技的奇妙。他以林则徐的“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思想，批判了封建顽固派把西方科技看成是奇技淫巧的说法，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因此，他主张效法俄国彼得大帝向外国学习的精神：提倡科学技术，开

①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治学》。

② 魏源：《圣武记》卷十一。

设工厂，建立新式交通工业，制造器械等。他深信，只要中国人努力向这方面学习，一定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

显而易见，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教育思想已在一定程度上切中时弊，开启了近代教育改革的车轮。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十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领袖们，为了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也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教育主张。其内容如下：

第一，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注重科学技术，要求学习西方文化教育，放眼看世界。据历史记载，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洪秀全等人就表示要仿造汽船、铁路、电线及其他西洋机器。他们一方面极力反对当时清朝教育的空疏腐化，另一方面尽力罗致、培养各种科技人才。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英、法、德、美、俄等国情况，希望太平天国革除社会陋习，设立邮亭、新闻馆、书信馆、士民公会、学馆等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第二，提倡儿童、妇女教育。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记载，太平天国对儿童实施一种普遍性与平等性的教育制度：“凡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此外，太平天国还创立一种“带徒弟”的教育制度，鼓励各级官员多多收养儿童，用父子般亲爱的教育方法授予儿童各种知识和技能。另据《太平天国亲历记》记载：“太平天国尊重妇女地位，认为妇女为男子的伴侣，在教育上她们受到了同等的注意。”

第三，主张改革文字和科举制度。太平天国在文字改革方面较有成绩，其文书不但一律加以标点符号，还颁布了反对封建古文、提倡语体文的命令。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反对“浮文”、“巧语”、“故实”，“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使人一目了然。此外，太平天国对科举制度加以改进，既简化了科举手

续，又改变了考试内容，不论男女贵贱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科考。

太平天国运动揭开了中国农民革命教育的新篇章，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在清王朝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又一新的事变，即洋务运动。这是一个以封建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贵族官僚为领导的救亡图存运动，其行动纲领就是“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基本教育思想。著名洋务活动家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这一思想予以充分阐述。他认为，“中学”主要指以纲常名教为思想内核的中国“经史之学”，“西学”主要指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和制造工艺技术。二者的关系是：“中学”为本，可以“正人心”，“西学”为末，可以“开风气”；“讲西学必先通中学”，否则就会导致离经叛道。很明显，“中体西用”的宗旨就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为根本，在此基础上，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之洞提出一系列改革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建议：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学校应当新旧兼学、政艺兼顾，不应成为科举的附庸；要重视留学教育，发展实业教育；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废止旧式朝考制度。

“中体西用”思想，实际上是以西方的科学来造就一批能维护封建制度，进而达到“自强求富”目的的人才。这一思想尽管有极大的局限性，但明确肯定了向西方学习的教育思想，客观上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洋务运动期间，还有一股与洋务教育思潮相伴而行的教育思潮，即早期改良主义教育思潮。代表人物有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人。

容闳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位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主

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设立各级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武备学校、海军学校等。他在《予之教育计划》中，力主选派颖秀青年去美国留学，并建议发展汽船、矿务、铁路运输等，借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中指出：人才的多寡，取决于学校，“学校隘则人才乏，学校广则人才多”，因此国家应当大力兴办学校。

冯桂芬曾在《改科举议》、《采西学议》、《广取士议》和《停武试议》等文中，提出一系列教育改革的主张。他大胆揭露科举制度只能“禁锢人生之心思才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他极力要求发展西学，建议在广东、上海设立翻译公所，选择十五岁以下儿童入馆学习，借以培养翻译人才。郑观应主张建立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校，并认为学校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在《考试》一文中，曾建议“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他还要求学习西学，废除八股，改良科举，主张文试要“废时文”，武试要“废弓矢”。

王韬曾多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一方面提出了以欧洲为模式的变法自强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要求对人民施行以君主立宪政治为中心的教育，提出“教民以富”的实业教育计划。在兴办学校方面，他提出着重设立专科、实学及“时务”方面的学校，要求提高教学效率，撤换无能的地方教谕训导和书院山长。在改革科举方面，他力主废除八股，“专注于器艺学术，废帖括，重实学”，“不尚虚文”。

总而言之，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出学西学、设学校、改科举等重要教育主张，在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三

19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兴起一场轰轰烈烈

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首的变法领袖们在总结洋务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有系统的教育改革计划，从而在中国教育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个思想体系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托古改制”、“三世进化”为理论依据的变法维新教育思想。“托古改制”是康有为的主要理论武器，他在《孔子改制考》中，特别发挥春秋三世之义，把自己的变法思想，依附于孔子的言论，继承了今文经学家的讲学论政学风。他在大讲西学的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思想，并结合《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对他所强调的孔子春秋三世进化中的大同世界作了远景描述，从而建立起他的比较系统的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进化的时代，因此必须实行符合“升平世”时代要求的小康主义教育改革，为将来的大同主义教育准备条件。他强烈要求改革旧教育，模仿西方近代学校制度，大力发展科技、工艺教育，重视商学研究，开展君主立宪思想教育，提倡“群育”，统一语言，加强妇女、儿童教育等。

梁启超也是“三世进化”理论的积极支持者。他十分注重学校教育，严正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民智不开，人才缺乏，广大妇女不读书，农工商兵也不知学，而少数知识分子又都埋头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盼望猎取功名利禄。因此，他呼吁，中国如欲谋求富强，非大力培养人才不可；而培养人才，又非改变愚民政策不可。他提出培养人才的主要办法是改变八股取士制度，学习西方学校制度，特别要注重师范、女学和幼学。

严复大力宣传“天演论”思想，支持了“三世进化”理论。他坚决反对八股取士，认为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知识分子“习为剽窃诡随之事”，“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在

在他看来，被统治者奉为圭臬的理学是无用无实之学，其它如考据、古文、词章之学，也都空泛乏味，毫无益处。因此，他高呼“大讲西学”，强调“西学为中国诸务之急”。

第二，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维新派反对“中体西用”，要求体用合一地引进西方文化。严复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西方“皆有以胜我者也”。例如，在政治上，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优于我国专制政体；在体格上，西方“鸷悍长大，即胜我矣”；在品德及智力上，西方人“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因此，在学习西方科技时，还必须同时学习西方政教，因为“体”与“用”是统一的，“有牛之体，然后有牛之用”，要讲西学之“用”，就不得不讲西学之“体”。严复认为，全面向西方学习，主要在于民智、民德、民主三方面。要想开发民智，就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及语言文学，学习西方的治学方法；要想发展民德，就要学习西方人的美德；发扬西方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精神和“皆为天之赤子”的平等思想。

第三，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教育思想的萌发。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虽然一再鼓吹君主立宪，但以谭嗣同为首的少数激进人士逐渐偏离了“尊君”航道，出现了“民主”意向。谭嗣同认为法国革命是“泄万民之恨”的正义事业，提出了“冲决君主之网罗”的口号，在《仁学》一书中，他把封建纲常斥为“暴乱无理之法”，大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之说，断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二千年来之学，苟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另一位维新活动家唐才常也再三讴歌美国革命，把美国式民主立宪看作是“风俗纯厚，洵乎大公”，要求打破专制体制，“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民主思想的萌发，意味着中国近代教育已发生了重大转机，从此中国教育的指导思想开始由尊君向隆民过度。

四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从“革命”需要出发，纷纷阐述

“革命之教育”，从而把中国教育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以孙中山、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最为突出。

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以“三民主义”为核心。首先，他提倡民权思想教育。他认为，要想在中国实行“宪治”，就必须发展教育，向民众灌输民权思想，“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因此，他十分重视民主精神的培养和运用民主政治能力的训练。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提出了所谓的“训政”计划，其目的就在于教育人民摒弃“专制时代的种种恶习”，学会运用新的政治体制。他认为，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速达也。”因此，民权思想教育刻不容缓。

其次，孙中山提倡民族思想教育。他认为，反清革命不是反对满族，而是反对满人的统治。因此他主张把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革命教育思想和宣传民主立宪的民主革命教育思想结合起来，要求人们将满族统治者和满族人民区分开来，避免极端民族仇视情绪。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要求汉、满、蒙、回、藏“相与和衷共济，丕振实业，促进教育”，主张“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立于平等地位”。在对待外国态度上，孙中山反对崇洋媚外，要求留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必须结合民族需要，不要机械照搬，不能“奉欧美为至上”。

再次，孙中山提倡民生思想教育。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四大纲领。其中前三项是改良社会的经济措施，后一项是改良社会的教育措施。孙中山认为民生充裕是教育普及的基本前提，只有国家富裕了，才能用公款兴办各种教育事业。因此，他号召教育家“研究建设之学问”，要求教育界人士力求“自用聪明才力，发明种种机器”，以促进各种实业的发展，实现民生主义理想。同时，孙中山还注重女子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他说：“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不注意，故有学问

者正少，处于今日，自应认真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他还主张在“蒙古回疆同胞”中推行教育，培养他们的“共和国之主人翁”精神。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进的教育思想。“五育”是指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蔡元培认为，要“养成共同国健全人格”，必须“五育”并进。军国民教育可强健筋骨，培养国民的战斗力，实利主义教育可开发智力，为国家创造财富，公民道德教育可育成“自由、平等、亲爱”的精神，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则可陶养感情，健全心理。

其次，蔡元培提出了“教育独立”、“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主张教育应脱离政党与教会而独立。他要求学生专研学术、不参加政治活动，提倡“教育救国”、“科学万能”。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曾努力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应当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超阶级超政治的学府，在里面不应当“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的教义”来束缚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应当让各种学派、各阶级的思想自由发展。

再次，蔡元培提出发展个性、崇尚自然的教育主张。他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中指出：“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因此，在教学方法方面，蔡元培反对一般学校所用的“注入式”教学法，注重学生自动、自学、自助、自己研究的方法。他还提倡“即工即学”、“边工边学”方法，让儿童从实际工作和活动中获得知识学问。在学校管理方面，他主张“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提倡“学分制”，让学生各就“性之所近”自由选择科系和课程，并废止了“束缚个人不能任其自由发展”的“年级制”。

度”。

此外，秋瑾的教育思想也值得注意。作为一名女教育家，秋瑾曾主持绍兴大通师范学校，创办了《中国女报》，积极提倡普及女子教育，她认为，女子占人口之半，应和男子分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国家事务，实现男女平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广女学，普及女子教育。她严厉批判了当时“求学者类皆无宗旨，无意识”的不良趋向，要求学生端正求学目的，以讲自由、振兴女权为教育宗旨，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脱奴隶之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

五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政府不但在政治上倒行逆施，而且在文化教育领域也掀起了复古尊孔的反动逆流。面对这一险恶的政治文化环境，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率先举起民主、科学及文学革命的大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教育为此耳目一新。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陈独秀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人。其教育贡献如下：

第一，提出唯民主义教育方针。陈独秀亲身体会到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思想复活的危害，极力主张在民众间开展民主教育运动。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号召国人“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要求青年追求民主，摆脱奴隶根性。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他提出应把唯民主义“作为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要求大家共同起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民奴的国家”，要做到有政治民主，“破坏君权”，有信仰民主，“否认教权”，有经济民主，有社会民主。

第二，提倡现实主义教育。陈独秀认为，哲学上的唯物论，宗教